

迷失在大英博物馆——《青春》的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

古帆¹

(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本文从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中大英博物馆作为实体阅读空间和象征性符号空间的特质出发, 讨论文本的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想象中是象征权威与孤独的实体乌托邦, 而在其个人经验中又被重新塑造为解构权威、联结孤独者的符号异托邦。这一过程所隐含的对故乡、自我、权威的认知心路进一步体现在库切对《青春》这一文本的叙事策略中。本文通过具体的阅读空间、再现的符号空间以及再生产的小说文本空间, 进一步探讨库切对后殖民与后现代背景下空间叙事与身份书写的回应。

关键词: 空间叙事; 身份; 《青春》; 库切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92

引言

库切 (J. M. Coetzee) 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青春》 (*Youth*, 2002) 以他 18 到 24 岁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为原型, 记述了主人公约翰的成长与蜕变。彼时他怀着伟大的诗人梦, 模仿偶像庞德 (Ezra Pound) 和艾略特 (T. S. Eliot), 从文化“落后”的边缘南非来到文化中心英国朝圣, 却意外以失落告终。伦敦没有为他开启文学创作的新世界, 反而埋葬了他的一腔创作激情; 没有帮助他彻底逃离过去, 反而把过去融入了他的血液; 没有让他摆脱南非的阴影成为正宗的英国人, 反而让他在英国与南非的夹缝中无所适从。这一段辛酸经历在库切一生的创作与自我身份认知道路中都意义非凡。而落笔之时, 他却放弃了颇具感伤主义的第一人称“我”, 选择了略带距离感的第三人称“他”。关于这种叙事方式的探讨颇丰, 《青春》中约翰的身份书写也备受关注, 但鲜有人将其中的身份书写与阅读和写作联系起来。《青春》不仅是一本成长小说, 也是一本关于读书和写作的元小说。书中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约翰的阅读感悟、对写作的认知和文思枯竭的痛苦。同很多逗留伦敦的作家一样, 约翰的阅读写作活动也在大英博物馆进行。大英博物馆既是实体的阅读空间, 又是库切笔下再现个人体验的符号空间。它所扮演的帝国权威代表和知识圣殿的官方角色与少年约翰对英国的幻象不谋而合, 而约翰身临其境的私人经验又展示了大英博物馆作为身份重塑和人际交往平台的另一面。而作为符号的博物馆又成为身处伦敦的南非白人约翰窥视自我的一面镜子。对博物馆阅览室的认知推动着约翰对自我的认知。尽管 24 岁的约翰并未因此顿悟, 反而招致了写作困境。但临近耄耋之年的库切却通过他的文本空间《青春》重现了这一空间与身份的交互影响, 为 24 岁的约翰失败的诗人梦画上圆满句号。本文从大英博物馆这一阅读空间出发, 探讨关于这一空间叙述与身份书写在《青春》中的关系。通过具体的阅读空间、再现的符号空间、以及再生产的小说文本空间, 探寻空间与身份的相互影响。

一、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作为镜像的乌托邦

图书馆作为约翰在南非的主要生活场所, 承载着他对自己身份的隐秘渴望与含蓄表达。虽然彼时的他尚未提及有关大英博物馆的只言片语, 但其所代表的文明最高权威和知识圣殿的身份已经隐藏在约翰对伦敦的想象之中。

《青春》开篇就暗示了约翰在构建自我身份之时对于图书馆的依赖。他以“图书馆管理员”的假冒身份租房, 把工作单位写作“大学图书馆”。他在开普敦大学的主要生活空间是图书馆, 因为那里收集了艺术的顶峰之作; 图书馆也是他想象中浪漫爱情的肇始, 因为女人在这里透过“男人古怪木讷的外表, 看到他心中燃烧的烈焰” (Coetzee, 2002:3)。值得注意的是, 约翰对艺术顶峰的认知中潜藏着作为“野蛮人”的深切自卑。他之所以痴迷阅读, 是因为他想“在出国前把值得一读的书都读完, 这样等他到了欧洲, 就不会是个外省的土包子了” (Coetzee, 2002:25)。少年约翰头脑中形成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与他的教育经历息息相关。约翰早年的阅读书目包括庞德、艾略特、蒲柏、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等等。这份全部由英国文人组成的书单, 恰好代表了帝国在南非意识形态殖民的最高成就。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是以帝国建立殖民地作为标志的: “英语学习与帝国壮大产生于同一个意识形态顶峰。” (Ashcroft, et al., 2004:3) 二者的发展相互依存, 导致了“人为建构价值观 (如文明、人文) 等的自

作者简介: 古帆 (1991—),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 20 世纪英语文学。

然化，将野蛮、本土、原始作为其对立面”（Ashcroft, et al., 2004:3）。英国作为文明的权威与殖民地作为野蛮的边缘这一二元对立就在英国文学教育中得以内化，约翰也受到知识这一原罪的侵蚀。而大英博物馆所标榜的“文明守护者”这一称号，本身也成为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展台。被展览的物品与观看者不能平等对话，因为“无声而被动的展品被置于观看者的凝视下，而观看这一行为又受到官方意识形态规则的制约”（Bohrer, 1994:198）。大英博物馆代表了英国丰富的殖民掠夺结果，其丰富的展品多半是战争的胜利品。这些掠夺自东方古文明的展品被置于大英博物馆之初就带着失败者的沮丧，不可避免的因其异域情调被划分为他者。作为战利品的他者与帝国文明的并置无疑衬托出帝国文化的优越感，而参观者在大英博物馆的教化下也继承了帝国文明之优越这一意识形态。由此，大英博物馆的官方意识形态与约翰的朝圣愿望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在约翰眼中，图书馆也是一堵隔绝艺术家约翰和俗世的高墙。少年约翰投入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图书馆是他的孤岛，保障他通过阅读体验与自身对话。约翰对文学符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与杰奎琳同居的不适感上。当杰奎琳偷看他的日记，发现他的不快要提出分手时，他勃然大怒，认为“没人可以阅读别人的隐私文字”（Coetzee, 2002:8）。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约翰对阅读和写作的理解：写作是一种保持孤独和自我的方法，读写活动本身应该是一项隐私、幽闭、孤独的工作。这种理解也体现在他对伦敦的艺术幻想中：“伦敦也许如石头般冷漠、如迷宫般复杂，让人觉得寒冷，但在它那令人生畏的高墙后面，男男女女都在忙着写书、绘画、创作音乐。”（Coetzee, 2002:41）高墙之内的男男女女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路人猜不到他们的秘密。而大英博物馆，那个将要作为约翰学习研究的主要场所的地方，更是有一堵堵高墙保护他那颗脆弱的心灵，为他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孤独而富有的空间。而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作为知识工厂用于学术研究，则是其开放之始的官方意志。一份于1835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投资博物馆的申请中提到：“希望这个国家的穷学生也能和富人一样，通过同样的阅读途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跟随理性的追求，有同样权威的资料做参考，探测最复杂莫测的疑问。我力主政府理应在这方面给他们最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援助。”（“Select Committee.” 1835:4795）这份申请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重点开放对象锚定为学生，将其重点用途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大英博物馆面向学生开放的初衷是给他们提供权威的参考资料，启发他们发掘悬而未决的思想难题，帮助他们勇攀智慧高峰。这份申请和约翰对艺术创作的设想一样，都强调了读书、写作作为一门内心活动的性质。图书馆的高墙成为公平和孤独的保证，期待着智慧的花朵开放在每个人的孤岛上。

尚未踏入伦敦的约翰早已把英国视为艺术理想的乌托邦。而他对读书写作和图书馆的依赖，也为此后大英博物馆作为他创造个人艺术空间的主要场所奠定了基础。更可贵的是，大英博物馆给少年约翰的镜像并非是无的。恰恰相反，这一镜像也正是大英博物馆苦苦树立的官方形象：来自五湖四海的藏书汇聚于此，在他者同自我的冲突中凸显自己的卑微，展示帝国作为艺术中心的权威；阅览室被打造成严肃的学术场所，知识的生产工厂，以保障智慧与灵魂孤独的自我对话。然而这种官方形象的打造过程又出现矛盾，从而使得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私人体验中展现了其身份的另一面。镜像乌托邦转变为符号异托邦，约翰对大英博物馆的亲身体验也促使他重新思考南非与英国、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二、约翰的阅览室：作为补充的异托邦

福柯通过镜子的隐喻描述了“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福柯指出，镜中呈现的镜像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人看到镜子中的环境，会意识到自己在镜子中的不在场。而从人的镜像对本体的凝视角度来看，它证实了本体所处空间的真实性。人要意识到所处空间的真实性，则需要凝视不存在的镜像，由此，镜像让自己所处的空间变得既真实又不真实。反过来，镜子本身也兼具了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的性质，这就是异托邦。（Foucault, 1986: 24）

大英博物馆作为库切笔下的符号空间，也兼具了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的特质。这主要通过约翰的阅读经验得以再现。《青春》中从来没有过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藏书量的正面描写，但我们依旧可以从约翰的阅读经历中窥斑见豹。与他在南非时英国作家雄踞其书单的状况相比，身在伦敦的约翰阅读范围显然扩大了许多。他不再局限于18到20世纪的英法文明，而是广泛涉猎了各国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如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智利诗人巴勃罗·聂努达（Pablo Neruda），奥地利作家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荷兰诗人西蒙·温肯努格（Simon Vinkenoog）等。由此，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成为福柯笔下“收集所有物品，建立普遍档案，将所有的时代、时期、形式、品味”（Foucault, 1986:26）都汇集于此的空间。而这一用于粉饰自己权威的空间，却在约翰的经历中解构了自我权威。福柯指出，建造一个包含了所有时间的地方，其“本身就被置于时间之外”（Foucault, 1986:26）。换言之，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这一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书籍都搜集展览于此的行为本身，就打破了时间的线性顺序。时间在这里被空间化，过去与现在得以并置。当过去被呈现为一种现在的在场，过去就很难从现在中割裂出去，一切时空的集合变成当下的在

场。这一时空并置也在悄然改变着约翰对南非的认知，当他坐在阅览室无力继续自己的论文时，他“允许自己享受一头扎进有关旧日南非书籍的奢侈里”（Coetzee, 2002:136）。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书中阅读曾经走过的街道给了约翰一种怪异的感觉。他被进入南非腹地的冒险故事深深吸引，感到他正在阅读的是“他的国家，他心中的国家”（Coetzee, 2002:137）。大英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身份通过南非的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想象并存表现出来。18世纪的南非穿越时空，成为此时此刻约翰思绪的背景。约翰明知那样的南非已经过去了，可是《伯切尔游记》（*Burchell's Travel*）在他眼中却有“真实的光环”（Coetzee, 2002:138）。他并不在乎时间是否过去，总觉得这就是他心中的国家。他开始问自己：“是不是渴望回到旧日的南非，那个可能建立伊甸园的时代？”（Coetzee, 2002:137）阅读活动扭转了约翰一心要割断过去的渴望，他开始去思考，甚至思念他不愿承认的祖国。燕卜苏（William Empson）在讨论博物馆的展品时指出，过去的展品提供了过多过去的信息，过去的信息膨胀以至于涌入了现在的空间，“混淆了人们对现在的判断”。（2000:9）而对于原本就丢失了自我认知的主体而言，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阅读活动反而可能促进身份的重塑。约翰一改对荒蛮南非的厌恶，开始渴望像伯切尔一样写一本具有说服力的书，却苦于找不到素材：“他没有像历史学家一样受过训练，反正他要找的东西也不在历史书里，因为他们属于平凡单调的事物，平凡如空气。他去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过去世界的常识呢，那些卑微到不知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知识的知识？”（Coetzee, 2002:156）大英博物馆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就在一个少年的困惑中被解构了。丰富的藏书带来时空并置的体验，其结果是让约翰意识到过去对于现在的意义，过去之不可分割。于是对英国文学权威的至上崇拜转化为反求诸己的过程。他的关注点同很多流亡作家一样，“侧重于在艺术中对家园的描述”（Gurr, 1981:25）。而他家园的真相，不是历史书中的宏大叙事，而是最平凡的生活琐事。在描写家园面前，大英博物馆浩如烟海的书卷失去了它的力量。

大英博物馆遗世独立的官方形象也在文本的再现中被打破了。约翰所幻想的冷峻与孤独的代言人变成了暗藏人际交往机遇的平台。谈及阅览室作为异托邦所具有的“孤立且可渗透”的矛盾，伯恩施坦（Susan David Bernstein）认为阅览室的环形设计促进了“方便社交和联想的外部性”（2013:16）。环形的设计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又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即可保证私人的阅读空间，又提供了社交的可能。由此可见，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既是保障个人隐私的空间，也是破坏个人隐私的空间。约翰将“每个周六下午和每周闭馆的两个晚上”（Coetzee, 2002:54）都耗在大英博物馆阅读福特的书。这种私人、隐秘的阅读体验终于在一个周六被打破了。约翰和邻座的读者聊了起来，甚至相见恨晚地到茶室喝茶。作为严肃学术领地的大英博物馆失败了，它不仅没有带给约翰研究的新思路，激起他深入探寻的好奇心，反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大英博物馆为约翰提供关于福特研究的大量素材，却只让他感到困倦，需要勉强自己才能读下去。而在大英博物馆邂逅波兰女孩安娜却让他找到了共鸣。他们谈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非洲的时光”，“他早年在波兰的生活和后来想成为英国乡绅的渴望”（Coetzee, 2002:54）。他开始怀疑在大英博物馆遇见的这个康拉德的同胞安娜是否是他的命中注定。大英博物馆在这里已俨然不是知识的神龛了，它变成一个异托邦，在这里除了阅读，还生产出无数“空间的可能性”（Bourdieu, 1990:177）。它“既是公共的，又是关闭的；既能保证私人的、安静的阅读，也能滋生广泛的知识信息网和政治运动”（Bernstein, 2013:1）。这个既开放又关闭的空间对于生活在伦敦的异乡人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约翰与安娜之所以对康拉德产生共鸣，是因为他早年在非洲，流亡到波兰，又渴望做纯正的英国人。康拉德的经历，如果不是安娜的，也正是约翰心路历程的写照。他们的共鸣都指向了康拉德的流亡身份。对比约翰在火车上或在 IBM 没有女孩愿意同他攀谈的经历，和安娜的这一次谈话就更加重要。他们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都在流亡，而之所以能够碰面，是因为都流亡在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用途丰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是生产作坊，对另一些人是休憩之所；有人用它作最高价值的研究，但在很多情况下他都仅仅是一个容身之处”（Bernstein, 2013:1）。而在约翰的个人体验中，这两种用途是兼具的。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来到帝国的博物馆往往产生超越预料的结果，而在保护他创作隐私的图书馆中主动打破这份隐私，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他想：“我和这些在大英博物馆深处孤独的游荡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这种精神生活本身就是报答。”（Coetzee, 2002:55）从坚信“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自我隔离，到把这一批游荡者看作“我们”，约翰开始重新认识孤独。对文学艺术的执念可能并不能让他成为地道的英国人，只让他成为这些孤独的游荡者，这些处于夹缝中的人中的一个。

约翰在大英博物馆的个人经历打碎了他通过追寻正统文学实现身份转变的梦想。大英博物馆在约翰的个人体验中也不再是统一的以帝国意志为中心的镜像，他变成多元的、杂糅的结合体，容纳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敬畏帝国权威的同时解构了权威，在隔离自我的同时找到同伴，在挣脱孤独的努力中理解孤独。如果说 24 岁的约翰尚未能将这一系列私人化体验转变成诗，从而招致了写作困境，那么写作《青春》之时，库切显然已经将这些中心——边缘、过去——现在的时空体验与身份转变内化成了其创作方法的一部分。

三、库切的《青春》：构建文本空间的叙事策略

《青春》与大部分自传体小说的不同在于，时态上使用一般现在时讲述过去的回忆，人称上采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叙述青年的经历。这两个突出的特点并不能被割裂开来。因为传统自传体写作应该普遍使用第一人叙述和一般过去时。小说在这两点上均有突破。如果仅仅把重点放在第三人称写作上（即大多数批评的做法），就很容易将一般现在时视为理所当然，因为第三人称叙事从表面看就是客观的，即时的。如果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张力便显现出来。

阿特里奇 (Derek Attridge) 指出，一般现在时“强化了被叙述事件的即时性，并拒绝对文本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回溯处理，拒绝从任何可能的位置回忆或表达对所叙述行为、态度的悔恨之情” (2004:143)。这确实呼应着库切在《青春》中力图形成的关于“当下”自我的真相。但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觉到隐含作者对过去那个自我的审视，这是通过改变聚焦者实现的。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 在视角 (point of view) 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聚焦 (focalization) 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分清谁看和谁说，也就是强调叙述视觉与叙述声音的分离。热奈特将聚焦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并用近乎数学公式一般的方法阐释了三种聚焦的含义，就叙述者与对人物获取信息的状况而言，若叙述者 (narrator) > 人物 (character)，则为零聚焦；叙述者 = 人物，则为内聚焦；叙述者 < 人物，则为外聚焦。热奈特提出分辨内外聚焦的标准是，由第三人称叙事的文本，如果可以改为第一人叙述，则叙事方法为内聚焦。(1990:129) 青春中只有一个叙述声音，却有两个聚焦者，即从南非游荡到英国的少年约翰和隐含作者老年库切。少年约翰是苦闷急躁的，他渴求一个正统的英国身份而不得，急切效仿先贤的朝圣之路而不能，最终陷入再也无法写作的境地。而老年的库切已有了丰富的流亡经历，他从南非到英国，辗转美国，回到南非，最后在澳大利亚安定下来。他已经习惯一个流亡者的无家性 (not-at-homeness)，不再期待安定和永恒。这两种态度在青春中通过两个聚焦者表现出来。在涉及南非的问题上，少年约翰执着地拒绝自己的故土，他坚持认为：“非洲是你们的。” (Coetzee, 2002:121) 他急切地撇清自己与非洲的关系，苦苦思索怎样做一个英国人：“他还要在英国住多久才能真正地变成英国人？拿到英国护照够吗？还是这个听着古怪的外国名字会将他永远排除在外？‘做个英国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Coetzee, 2002:103) 此刻的叙述者与少年约翰分享一样的心情，无比向往一个正宗的英国人身份，得不到又无比茫然。这里通过内聚焦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少年极端绝望而悲苦的内心独白。而作为隐含作者的库切对这一身份的认知则要理性的多。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时，少年却丧失了他该有的惊慌，一个理智的聚焦者代替了少年的聚焦：“他属于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在南非他只是个幽灵，一缕迅速散去的轻烟，马上就会永远消失。而在伦敦，他也同样不为人知。” (Coetzee, 2002:130-31) 这句话的冷漠多过了少年的绝望，是隐含作者通过外聚焦展示了库切多年后对活在夹缝中这一生存状态淡漠的认知。由此，通过内外聚焦的转换，文本实现了第一人叙述过去时的传统自传产生的反思录效果，将少年约翰的绝望与老年库切的理智并置起来，从而在一般现在时的基础上将文本变成将时间空间化的异托邦。

一个共识是：一般现在时用客观的眼光再现了过去的事件，过去时与现在时之间的转换将叙述者从“事件的见证者”变成“历史学家”。(刘江, 2011:53)。但自传与一般小说的不同在于，叙述者、隐含作者和作者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身份，叙述者并不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客观地重建事件现场，所以自传体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实质是同步叙述过去的事件，类似于临时新闻播报。叙述的我把读者拉向经验的我，从而将读者拉近他回忆的长河，把一段回忆性的讲述变为读者可知可感的故事。在自传中使用一般现在时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把读者从被动的听者变为参与到故事中的人，“有效地缩短叙述者(自传者)和读者之间的叙事距离，从而使读者更容易沉浸在自传作者重构的真实世界之中，也更难以察觉自传者潜藏于文字之下的真实意图”(刘江, 2011:53)。通过一般现在时拉近距离的同时，库切又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作策略，这是一种“默许作者与自传的经验主体保持距离感”(Lenta, 2003:168)的方式。在《青春》中，这种方式在约翰与母亲的关系中体现极为明显。小说中有一段他与母亲关系的总结：“他知道，他的冷漠让母亲沮丧，他这一生都在以这种冷漠回应她的爱。她一直想悉心照料他，而他一生都在抵抗。尽管他一再坚持，她仍然不相信他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一见到他她就往他的口袋里塞钱，或一英镑或两英镑的钞票。她说这‘只是一点点’。只要给她一点机会，她就会缝补他公寓里的窗帘，给他洗衣服，他必须硬起心肠对待她。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Coetzee, 2002:18)

在这段描写中，叙述者显然与少年约翰采取了不同态度。少年约翰对母亲的爱充满敌意，这种敌意来源于他想把这段属于南非的过去连根拔起的渴望。而叙述者却更加客观，从他的细节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一心为儿子付出却得不到理解但依然对儿子关怀备至、不求回报的慈母形象。在库切早期论文《阿赫特贝尔的〈煤气管道工人之歌〉》(Achterberg's "allade van de gasfitter": The Mystery of You and I) 中，库切总结了“我”“你”“他/她”的指称关系。他指出传统忏悔录样式的自传体小说采取的是“我——你”的话语关系，即“我”作为中心陈述主体，“你”作为目的物，作为独白中心的“我”凌驾于作为受话者的“你”身上，不具有对话性。(庄华萍, 2013:55) 而第三人称的植入，打破了这一“我——你”的权威结构，使得被动的听众变为主动的评论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叙述声音和叙述意识被分隔开来，使读者在参与主体经验的同时也看到了经验主体无法看到自己的一面，即他年少轻狂时代的傲慢、偏见与自私，从而对母亲产生同情。由此可见，一般现在时与第三人称叙事的结合，使得文本本身成为既孤立又可穿透的异托邦。读者既走入了人物的亲身经历中，又与人物拉开距离，与人的经历产生对话；既聆听了叙述者的讲述，又解构了叙述者的权威。

结语

作为一部讲述库切青春的小说，《青春》并没有回溯少年成长之路的方方面面。它致力于描绘一个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得意之前的失意之路，他对艺术的幼稚的幻想，他对身份求而不得的惊惧。因此这本书也成为一本关于

读书写作的小小说。约翰因对文学与创作的热忱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结下不解之缘，而荷兰南非裔的身份又将英国与南非隔断在他的世界之外。大英博物馆是约翰高山仰止的权威，承载着他孤独的梦想，即借艺术重塑身份的渴望。而独特的身份又干扰了私人阅读经历，于是作为符号再现的大英博物馆解构了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既生产孤独感，又联合孤独者。这一符号空间所体现的囊括时空也搅乱时空，遗世独立又滋生联系的双重身份促进了约翰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消解掉他个人对于过去——现在、南非——英国在文明——野蛮的框架中的二元对立。于是小说不再只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还是对所谓文化的中心与边缘这一持久博弈的回应。与此同时，对大英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再现也影响了《青春》这一文本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库切创造性的将第三人称和一般现在时用于回忆录似的自传体写作，将读者带入少年库切的心路历程，同时保证读者的客观性以便跳出约翰的经验自我做出评价。通过内外聚焦的转化，成功将叙述者的理性认知与经验自我的非理性冲动并置起来，又一次体现了库切要在写作中形成当下自我真相的观点。这种将读者邀请到文本之中又置于文本之外、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在时空上的并置也为后现代写作的历史问题增加了一种可能。由此，《青春》通过空间叙事和身份书写实现了库切对后殖民视野下身份认知和后现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双重回应。

参考文献:

- [1] Coetzee J. M. *Youth*[M]. London: Vintage, 2002.
- [2] Ashcroft B,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3] Bohrer F N. The Times and Spaces of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ssyria, and the British Museum[A]// Daniel J. Sherman and Itit Rogoff. Eds. *Museums Cultures: History, Discourse, Spectacles*. London: Routledge, 1994:197-222.
- [4]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ondition, Management, and Affairs of the British Museu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R]. London: Hansard, 1835.
- [5] 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J]. Jay Miskowiec. Trans. *Diacritics*, 1984, 16(1):22-27.
- [6] Empson W. Homage to the British Museum[C]// Haffenden J. Ed. *The Complete Poems*. London: Allen Lane, 2000:9.
- [7] Gurr A. *Writers in Exile*[M].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1.
- [8] Bernstein S D. *Roomscape: Women Writers in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George Eliot to Virginia Woolf*[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9]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 Richard Nice. Trans. London: Sage, 1990.
- [10] Attridge D. J. M. Coetzee & Ethic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 the Even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11]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 [12] 刘江. 自传中现在时的身份叙事向度——《富兰克林自传》的个案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07):52-56+61.
- [13] Lenta M. *Autrebiography: J. M. Coetzee's Boyhood and Youth*[J]. *English in Africa*, 2003, 30(1):157-169.
- [14] 庄华萍. 库切“自传三部曲”中的人称、时态与自我[J]. *外国文学*, 2013(03):53-60+158.

Wrestling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Spatial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Youth

Gu Fan¹

¹*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in J. M. Coetzee'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Youth*—as both a physical and symbolic space—and investigates its spatial narrative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he protagonist John's early imagination, the British Museum appears as a concrete utopia symbolizing authority and solitude. However, in his lived experience, it is reconfigured as a heterotopia that dismantles authority and connects solitary individuals.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a cognitive trajectory in John's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homeland, selfhood, and authority, one that is further reflected in Coetzee's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Youth*. By examining the material reading space, the represented symbolic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ed textual spac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etzee engages with the paradigm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identification within postcolonial and postmodern contexts.

Keywords: Spatial narrative; Identity; *Youth*; J. M. Coetzee